

博古和他的时代

秦邦宪（博古）研究论集（下册）

主编 邹贤敏 秦红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博古和他的 时代

秦邦宪（博古）研究论集（下册）

主编 邹贤敏 秦红



目录

contents

(上册)

第一辑 生是中华人 死是中华魂

略论秦邦宪的历史地位·····	富耀南	002
博古的曲折思想历程·····	陈夕	011
试论秦邦宪的历史功过·····	陈瑞良	019
知过即改 方为马列 ——纪念博古诞辰90周年·····	温济泽	029
秦邦宪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肖根荣	037
博古与周恩来·····	李海文	045
瞿秋白与秦邦宪关系述评(1925.9—1934.10)·····	龚景春	053
王明、博古比较研究·····	郭德宏	066
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	秦福铨	078
博古(秦邦宪)辉煌、短暂与悲壮的一生·····	黎辛	087
博古在遵义会议后的主要任职及活动·····	韩广富	093
博古访谈·····	[美]埃德加·斯诺	098
跟随博古同志长征 ——我的父亲康念祥的回忆片断·····	康小平	107
哭博古·····	郭沫若	133
他的心没有成灰·····	田汉	134

第二辑 上下求索 书生显意气

秦邦宪的早期革命活动·····	廖美珍 朱昱鹏	136
-----------------	---------	-----

秦邦宪与《无锡评论》	许浩良	142
有关秦邦宪就读苏工专的几个问题	朱昱鹏	146
秦邦宪早年在苏州	缪 军	150
秦邦宪早年思想探析	杨玉伦	153
秦邦宪早年思想撷珍	杨玉伦	160
在革命摇篮中成长	吴葆朴 李志英	164
王稼祥、秦邦宪、杨尚昆：从上海大学到中山大学	张元隆	169
秦邦宪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吴葆朴 李志英	177
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	杨尚昆	183

第三辑 临危受命 沉重的历史（上）

秦邦宪临危受命	吴葆朴 李志英	198
对临时中央也要一分为二	何 方	211
中央苏区的成长	黄道炫	217
博古中央在苏区的功与过	王健英	224
解读博古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总结	曹春荣	249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地位	金冲及	256
苏区时期的毛泽东和博古	杨奎松	262
中央苏区时期的张闻天、博古和毛泽东	杨尚昆	272
毛泽东在瑞金时期的真实处境	曹春荣	274
博古与反“罗明路线”	吴葆朴 李志英	283
回望反“罗明路线”斗争	曹春荣	291
查田运动与中央苏区民众动员	张宏卿 肖文燕	301
查田运动：理念/策略与现实	黄道炫	309
评苏区的分田运动和肃反斗争	杨奎松	315
上海中央为何要迁往苏区	[德] 奥托·布劳恩	322
回忆查田运动	朱开铨	325

第四辑 临危受命 沉重的历史（下）

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正面作用与影响	曹春荣	334
--------------------------	-----	-----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军政战略方针·····	陈荣华	343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 ——以广昌战役为中心·····	黄道炫	353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 ——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	黄道炫	377
论共产国际对福建事变的影响·····	张运洪	397
博古对待福建事变的态度缘何前许后拒? ·····	曹春荣	410
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	黄道炫	417
试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国内临时中央的关系·····	周文琪	434
“国际路线”和第三次“左”倾错误 ·····	金冲及	448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导(1933—1934)·····	王健英	465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研究·····	邵 雍	474
“左”倾路线与苏维埃共和国的兴亡 ·····	杨奎松	484
历史的弹性 ——如何看待中央苏区的失败·····	黄道炫	503
博古中央与福建事变·····	[德] 奥托·布劳恩	507

(下册)

第五辑 生死抉择 悲壮染征程

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与准备·····	王健英	512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准备·····	陈荣华 何友良	518
从《红色中华》的宣传报道看主力红军长征前的准备·····	王美芝	523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前奏 ——长征前的“调敌”和“探路” ·····	力 平 余熙山 殷子贤	532
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 ·····	黄道炫	543
动员突围和湘江之战·····	杨尚昆	558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遭受重大损失的情报原因·····	王美芝	559
惨烈的湘江之战 ——红军长征之二·····	石仲泉	567

长征准备工作中的两个问题·····	曹春荣	577
王彬彬三个“不得不”的谬误·····	黎辛	583
也谈瞿秋白为何没有长征·····	王龙	594
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	曹春荣	599
长征最重大的意义		
——第二次战略转移·····	荆南翔	602
地缘之变：长征被忽略的战略意义·····	林治波	609
从广昌战役到突围的建议及其准备工作·····	[德] 奥托·布劳恩	612
战斗在敌人经济封锁线上·····	李振山	623
回忆少共国际师·····	萧华	628
出发前·····	董必武	632

第六辑 顾全大局 一切为胜利

博古与湘江之战后的重大决策·····	吴葆朴 李志英	636
博古与遵义会议·····	秦福铨	639
遵义会议前后的秦邦宪·····	陈瑞良	650
博古拥护新中央的几件事·····	张培森	655

第七辑 坚持信仰 为党立新功（上）

不要忘记博古做的两件事·····	程中原	658
秦邦宪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重要作用·····	吴葆朴	662
抗战初期博古受命奔走大江南北·····	陈广湘	671
新四军成立经过新探·····	童志强	678
抗战初期博古在武汉·····	唐丽娟	687
秦邦宪建立和健全党的地下交通工作·····	吴葆朴 李志英	691
博古1935—1941年的新闻活动与新闻统一战线思想·····	张江红	693
秦邦宪批准我入党·····	沈安娜	702
忆博古同志和汉口《新华日报》·····	陆诒	706

第八辑 坚持信仰 为党立新功（下）

延安整风时期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清算·····	杨尚昆	712
一个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错误的人·····	富耀南	717
秦邦宪与党的新闻事业·····	尤望华 陈瑞良	720
博古，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与开拓者·····	黎 辛	725
博古呕心沥血主办《解放日报》·····	陈家鹦 邵晓秋	730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前前后后·····	朱鸿召	737
两度担任新华社社长的博古·····	万京华	740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历史反思和现实思考 ——兼谈党报改革的三点建议·····	黄 钦	745
博古与延安文艺·····	黎 辛	750
博古与《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翻译·····	黎 辛	760
解放前《共产党宣言》的六个中文译本·····	杨金海 胡永钦	764
博古翻译、编译、校阅的出版物·····	秦 红 整理	769
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	余光生 艾思奇 陈克寒	774
忆博古同志·····	刘祖春	776
从理论工作方面看博古同志·····	崇 基	778
悼念·····	默 涵	780
博古同志二三事·····	张映吾	782
日记的一页·····	田 方	784
悼博古同志·····	吴一铨	786
我们永远在一起·····	丁 玲	788
想起博古同志·····	艾 青	791
博古重身教 社长写消息·····	张德勤	792
博古印象·····	毕 群	793
忆《解放日报》改版与整风·····	吴文焘	794
对博古的点滴回忆·····	陈 坦	798
大海般的恩情 ——忆社长博古·····	张林冬 口述 田子渝 整理	800
解密“四八”空难：王若飞、博古、叶挺等17人遇难之谜·····	仲 朱	813

附 录

悼博古.....	张越霞	822
在博古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秦 钢	827
对父亲的埋怨、理解和崇敬.....	秦摩亚	829
父母离我很遥远		
——访博古之女秦吉玛.....	肖 莹	834
秦铁：我的父亲博古.....	胡展奋	839
对爷爷及那个时代的浅识.....	秦 红	848
无产阶级的领袖		
——刘群先.....	[美] 尼姆·韦尔斯	853
无产阶级的坚强女战士		
——张越霞生平事略.....	朱昱鹏	873
杨琳小传.....	《红色华润》编委会	875
后 记.....		882

第五輯

生死抉擇

悲壯染征程

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与准备^①

王健英

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与准备

历史地考察，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并非仓促决定和“仓猝的出动”，而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并进行过必要的准备。

1. 实行战略转移的酝酿和正式决定。其一，早在1934年2月中旬，共产国际致电博古提出：应当有相机撤退的应急措施，以避免被全部消灭的可能性。同时，国际驻上海中央局军事总顾问弗雷德致电瑞金，提出：一个月内集中主力向江西西部迅速挺进，直至湖南边界，占领南昌并尽可能攻占长沙。这个计划太冒险，遭到政治局和军委坚决拒绝。^②当时毛泽东和彭德怀先后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红军主力应跳出敌军包围，突进到苏浙皖赣或闽浙赣边区，以打破第五次“围剿”。其二，广昌战役失利后，在苏区内粉碎敌人“围剿”已极少可能。5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同中革军委开会，检讨反“围剿”的战略战术。考虑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绝大多数委员，这时原则上都同意突围。”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批准。6月16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③其三，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实行战略转移。据《遵义会议决议》称“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而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到“1934年8月初，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重新研究了军事形势……大家一致认为，此时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毛泽东也不再有什么异议”，“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八月——十月的新季度计划，这个计划像第一个季度计划一样，由周恩来重新加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讨论通过。并把它的大概内容通过上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④综上所述，

^① 节选自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文题为编者所拟。

^② 参见《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77、278页；[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85页。

^③ 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页；[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95、97页。

^④ 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12、113页。

实行战略转移经过酝酿，反复讨论，5月由中央书记处提出，8月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通过计划，并经共产国际批准。这是一次有计划战略转移，并非博古等几个人仓促决定的。

2. “三人团”的组成与职权。约在5月，中央书记处在考虑实行战略转移后，为进行准备与组织指挥，决定正式成立了由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它并非新成立的固定的有专门工作人员的“权力”或决策机构，而是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下，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的中央军事领导核心。称“三人团实际上是党、政、军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不妥。博古称“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是指军事领导工作。正如张闻天所指，“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①对“三人团”内部分工，笔者认为称“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讲法，值得商榷。事实上，党中央政治上重大决策并非完全由博古个人说了算。对战略转移、季度作战计划，派红七、红六军团先行转移等，均经过政治局与书记处集体讨论后决定的。《遵义会议决议》明确称，“书记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于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物质供应方面，……以及其他后方工作方面。”军事上虽然李德包办军委一切工作，但也并非全部军事决策与指挥均由李德个人说了算。决议亦指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②周恩来也非仅仅负责督促军事计划实施。他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第一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参与了党中央所有重要政治、军事、组织等决策，参与了军事计划（战略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制定，主管军委日常工作和红军长征的组织行动的实施，每份电令、指示最后均由他签发。但作战方针与临机指挥的实权、最高指挥权却由李德、博古掌握。

3. 实行战略转移前的准备。中央红军长征并非“仓猝的出动”，而是经过周密计划，进行过必要的准备。据笔者考证^③主要有：其一，扩大红军，补充大量兵员。5、6、7三个月扩大红军62269人。9月1日，中央组织部又通知“在九月之间动员三万新战士上前线”。9月10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一、三军团各编“两个充实的补充团”，每团1400名新战士。每军团应有民伕1380人。其二，军需物资装备的筹措。如兵工厂造炸弹每月5万个，翻造子弹每月70万粒，修理迫击炮弹3000个等。7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发布《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石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9月8日，《红色中华》报道福建完成借谷7.5万余担。中央机关号召募集20万双草鞋慰劳红军。其三，组建新的部队，健全军队后勤部门。为增强中央

① 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② 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页。

③ 见王健英：《中国红军史考评》，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316页。

红军主力，中革军委命令：8月26日成立军委教导师，下辖三个团；9月15日将红二十一师与红二十三师合编，成立红八军团。9月10日，军委命令建立各军团后方勤务部，以适应野战后勤保障统一领导的需要。这“是为军团各部队服务的移动的机关”。10月初，党中央及军委决定，将红军大学、红军第一、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学校合并，组成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辖四个营与上级干部队。其四，组织人事上的准备。“三人团”提出随军转移的高级干部名单。“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单位的干部，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李维汉称，8月他被博古派到江西粤赣两省委“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名单。”^①其五，军事行动上的协同部署。为了调动和牵制，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中心区的严密包围与推进，同时探寻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并于7月初派出红七军团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等率领的先遣队6000余人，挥师东出福建，兵临福州城下。转而北上浙南、皖南，进入闽浙赣苏区。沿途散发传单150万份，以实际行动扩大了中共坚主直接对日作战的政治影响，分散了国民党军东路军的兵力，减轻了红军东线压力。此前，周恩来代表中央及军委派程子华前往鄂豫皖苏区，向省委传达中央指令，红二十五军从原地向鄂豫陕边转移。随后，红二十五军以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出发西征。7月23日，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创立新的苏区。8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红六军团9700余人，从江西遂川突围离开湘赣苏区西征。实际担负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任务，先行探路，侦察地形、敌情，调动中央苏区西线敌军。这三支红军的先行转移，实际上是为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作准备的军事协调行动。其六，从宣传教育上也做了一定准备。从7月到9月，以“北上抗日”为政治军事基本口号，在中央苏区通过《红色中华》等报刊、会议、纪念八一建军节誓师等多种形式，对广大军民进行了广泛宣传教育。如7月4日中共中央纪念八一决定明确提出“准备随时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7月8日，博古在演讲中公开说，“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时期已经日益迫近，我们全体红色的军人，应当准备着在任何时候率领全国民众，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7月15日，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7月31日，毛泽东主席答记者问，号召援助抗日先遣队迅速前进。8月1日，瑞金举行2万余人阅兵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朱德领导举行抗日宣誓。当晚，周恩来作《目前政治形势和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战斗任务》的报告。8月10日，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45、343页。

军委印发《士兵工作提纲》，强调阐明对日作战的六大纲领和红军对日作战协定的三个条件，最近的北上抗日宣言等。实际是开始对主力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进行思想教育。9月4日，军委发布扩大红军三万的紧急动员令，明确称主力红军要“突破敌人封锁，以转入总的反攻”。9月29日，《红色中华》发表由张闻天撰写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实际是党中央的从思想上动员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公开文件。对此红军总政治部于10月5日，专门编写详细讨论提纲，9日发布“政治指令”，要求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

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部队

中央红军的突围行动并非“仓猝的出动”。除前述准备工作外，对决定转移的中央机关、红军主力部队的编组，出发前具体行军计划，集结地，前进通路，也进行了必要的具体准备。

1. 战略转移出发时的具体组织部署准备。主要有：各军团撤出战斗20天前，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应很爱惜”使用兵力，“应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失利时，应有组织的退出战斗”；命令赣南军区做好红军大队途经该区时的准备，消灭团匪，派出游击队，组织运输队等；选择红军大队集结地。9月中旬，毛泽东受中央委托到于都现地视察，报中央后，确定于都为大队集结地。随后周恩来到于都，选择行军路线、组织架桥；随军转移的地方干部集中编队。从9月中下旬开始，从各省委抽调挑选的100多名地方干部陆续集中到瑞金，由中央组织局将他们编成一个队。将党中央、中央政府等机关年大体弱的老同志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和妇女干部，中央医院部分伤病号组成为干部休养连。中央党、政、群机关干部，包括中央党校教职学员等，均编组为军事化的某大队、某中队，随军行动；深入摸底，作出周密详细切实可行的出动计划。军委总司令部至少提前一个月，开始清查各军团与军委机关直属队全部实力。10月8日的《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十分详细精确。10月9日颁发的《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逐日明确规定军委纵队、各军团、中央纵队的行军具体时间、地点、渡河地、前进地等，实际即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出发的命令。10月10日，中革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的组成及集中计划的命令》以及军委《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其制定，均事前经过深入现地侦察、勘测，周密计算，没有一定时间准备是拿不出来的；提前10天军委对各军团集结休整作出了部署；9月底，朱德致信广东陈济棠。10月5日，中央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到寻邬，同陈的代表秘密谈判，达成停战、通商等五项协议，为红军突围途经广东争取了通路。

2. 实行战略转移的中共中央领导成员、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的编队。其一，率领中央红军长征的中央领导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顾作霖病逝后递补）。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

邓发、凯丰。占现有政治局成员16人中的多数。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占现有书记处书记5人中的大多数。中央“三人团”：博古、周恩来、李德。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中共中央机关：中央书记处秘书刘少文，中央组织局局长兼组织部部长李维汉，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董必武，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王观澜，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张闻天，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校长李维汉、教务长冯雪峰。其二，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博古、周恩来、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邓发、李维汉共11人（占全部17名委员的大多数）。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长王稼祥，军事部部长朱德，劳动部部长邓振询，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内务部部长谢觉哉，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沙可夫，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国家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临时最高法院主席董必武等。共青团中央局：书记凯丰，秘书长胡耀邦，组织部部长刘英（女），宣传部部长郭潜，中国少年先锋队总队长王盛荣等。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中共党团书记、副委员长陈云，秘书长王子纲，社会部部长倪志侠，女工部部长刘群先（女），国家企业部部长马文等。其三，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军委委员共有：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张闻天、彭德怀、林彪、叶剑英、邵式平、毛泽东、王盛荣，占现有17人的大多数。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军委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叶剑英、张云逸。第一（作战）局局长彭雪枫。第二（侦察）局局长曾希圣。第三（通信）局局长王诤，政委伍云甫。第四（管理）局局长叶剑英兼，副局长杨立三、宋裕和。第五（训练）局，副局长龚竹清等。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代理主任李富春（原江西省委书记），秘书长萧向荣，组织部部长李弼庭，宣传部部长潘汉年，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兼，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叶季壮，政委凯丰。军委总卫生部部长兼政委贺诚。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金维映（女）。其四，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钟伟剑，政治部主任王首道。下辖：第一梯队，由总司令部第一、二、三局、通讯队、中央队组成，以彭雪枫为梯队长（司令员）兼政委；第二梯队由第四、五局、警卫营、总政治部及政治教导队组成，以罗彬（罗明山）为梯队长（司令员）兼政委；第三梯队由工兵营、炮兵营、运输一大队及部分医院组成，以武亭为梯队长（司令员）兼政委；第四梯队由军委干部团及勤务分队组成，梯队长（司令员）陈赓（军委干部团团团长），政委宋任穷（军委干部团政委）。其中行军出发走在前边的第一梯队第一队，是作战局及警卫排，博古、周恩来、朱德等在此同行；其后是中央队，即李德的分

队，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分队，王稼祥的分队。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开始亦称中央纵队），由中央党、政、群与军委其他机关人员组成。由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邵式平。下辖：第一梯队，由军委教导师组成，司令员兼政委张经武；第二梯队，由军委总供给部、军事工业局（兵工厂）、通信教导队等组成，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第三梯队，由军委总卫生部及部分医院组成，司令员兼政委贺诚；第四梯队，由中央党、政、群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和政治保卫团等组成。该纵队行军出发排在大队后部。其五，各军团编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吴亮平。下辖红一、二、十五师，共19880人。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政治保卫局局长张纯清，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郭潜。下辖红四、五、六师，共17805人。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10月初被李德提议撤销总参谋长职务，改任），政治部主任曾日三，政治保卫局局长欧阳毅，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邓振询。下辖红十三、三十四师，共12168人。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参谋长唐潜，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政治保卫局局长许建国，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刘晓（原粤赣省委书记）。下辖：红二十一、红二十三师，共10922人。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黄火青，政治保卫局局长李涛，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冯雪峰。下辖：红三、二十二师，共11538人。参加战略转移的总共8.6万余人。

3. 留在中央苏区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的党政军领导机关。10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和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候补中央委员陈潭秋等一批党、政、军、群机关领导干部，在中央苏区原地坚持斗争。成立了中共“中区”（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委员有项英、瞿秋白、陈潭秋、贺昌、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汪金祥等。常务委员：项英、陈潭秋、贺昌、陈毅、汪金祥。书记项英，组织部部长陈潭秋，宣传部部长瞿秋白。同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秘书长谢然之，内务部部长何叔衡，粮食部部长陈潭秋，教育部部长瞿秋白，司法部部长梁柏台，政治保卫局局长汪金祥，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周月林（女），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10月22日，根据中革军委电令，在瑞金宣布成立中革军委中央军委，司、政、后机关均由中革军委机关留下部分干部组成。司令员兼政委项英，参谋长龚楚，政治部主任贺昌。供给部部长邓子恢，政委郭实秋，副部长范树德。卫生部部长漆鲁鱼，政委王立中。直辖红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下辖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另有十几个独立团。总计约1.6万余人。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准备^①

陈荣华 何友良

1934年4月底广昌战役失败后，国民党军开始攻入中央苏区的基本区域。5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届五中全会上成立）在瑞金集议，讨论此前李德向博古提议的要准备作战略转移的问题。中央书记处决定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向湘鄂西地区转移，并随即发电请示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实行转移。此后，中央在继续指挥红军分路抗击敌军的同时，着手进行战略转移的直接准备。所有准备工作，是在中共中央筹划战略转移的决策组织“三人团”统筹下进行的。“三人团”中，博古、李德分别负责政治、军事问题的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最初的直接行动，是分派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西征。7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辟浙皖赣边新苏区给七军团的政治训令》。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又联合下达《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中央决定以寻淮洲、乐少华指挥的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击福建、浙江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浙皖赣边新苏区，并“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出击湖南中部创建新苏区，确立与红二军团贺龙部的可靠联系，联结江西与四川两大苏区，并“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红七、六军团按照中央命令，分别于7月6日、8月7日离开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踏上北上西征途程。红七军团入福建，攻福州，进浙江，转安徽，抵赣东北。该部在转战4省边境、行程3000多里后，与赣东北苏区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随后在方志敏领导下，继续进军皖南，震动南京。红六军团也以“极为飘忽，如水走隙”^②的迅猛动作由江西遂川横石进湘南，入广西，渡湘江，返湘西，抵黔东，与贺龙部会合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六、七军团的派出及其行动，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总体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节选自陈荣华、何友良编著：《中央苏区史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文题为编者所拟。

^② 南京《中央日报》民国23年9月15日。

分。它们“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①即在中央红军转移的总战略中，红七军团担负外线的战略牵制、战略掩护任务，红六军团担负了侦察敌情民情、探寻和开辟道路的战略先遣任务。

与派遣两支部队外线行动的同时，中央苏区内的准备工作也在秘密进行。在组织方面，7、8月间，博古曾派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到江西、粤赣省传达中央决定，“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②同时，中央组织局决定，“每个省至少选拔一名女干部跟随部队长途行军，担任照顾老弱干部、护理伤病同志的任务”。约于8月间，中央将转移的决定，传达到中央政府的部长级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一级的干部。8月底，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蔡畅即通知危秀英到“专为即将参加长征的干部举办的”中央党校学习班去学习。^③短期学习结束后，参加学习的同志被编成中央工作团。

中央政府则在瑞金附近的青山召开各部负责人会议，“布置善后工作”。^④会上，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⑤林伯渠又受命向中央直属机关的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准备转移到湘西去的决定，并详细布置了转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⑥9月初，中革军委也“把各部队的主要政治和军事干部召集到瑞金，通知撤退的计划”。^⑦

与此同时，负此全责的博古决定了中央一级和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人一级重要干部的去留。由于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左”倾思想作祟，瞿秋白、何叔衡等一批重要领导人被留在苏区。在物质方面，从7月至9月进行了大规模的突击准备，制造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筹集了许多钱粮物资，例如仅草鞋便准备了20万双。

在部队方面，主要工作是两项：一是突击开展扩红运动，以补充作战中严重消耗的部队。继7月扩红6万余人之后，9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局的通知、2日中革军委的紧急动员令等，均下达了1个月扩红3万名的紧急任务。据陈云估计，“自5月到9月召集了红军新兵将近10万人”。^⑧因此，到10月开始转移时，红军部队约有半数是新增补的兵员。二是从8月起，开始注意减少红军指战员的作战消耗，保护骨干力量。9月8日，朱德明确指示担负石城阻击战任务的彭德怀，“应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要“进行运动防御”，“不要准备石城的防御战斗，而应准

①《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15日）。

②李维汉：《回忆长征》。

③蔡畅：《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

④吴黎平：《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遵义会议之前的片断回忆》。

⑤吴亮平：《回忆张闻天》。

⑥李坚真：《融冰化雪步不停》。

⑦〔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51页。

⑧廉臣（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